

K826.2
7

孫思邈研究

陕西中医学院 中国医学史研究室
医史医古文教研室 主编
中国医史博物馆

BD60117

一九八二年十月

A904026

目 录

前 言

关于孙思邈医德中有价值的内容局限性及其历史地位

和影响 孙溥泉 (1)

象孙思邈那样用哲学指导医学 樊 哲 (18)

浅谈孙思邈在医学流派形成上的贡献 任春荣 (36)

略谈孙思邈对妇产科的贡献 辛智科 (45)

浅探孙思邈对儿科临床的贡献 苗 晋 (53)

《千金方》论治内科急症初探 张学文 (59)

《千金方》在传染病学方面的贡献 王志新、刘国强 (70)

孙思邈对针灸学术的创见 郭诚杰 (79)

孙思邈对眼科预防医学的贡献 周维梧 (83)

关于孙思邈《千金方》方剂成就及其对后世

的影响 孙溥泉 (85)

孙思邈生年辩 张厚墉 (101)

孙思邈是怎样成为名医的 孙溥泉 (109)

孙思邈中进士问题及其它 王正宇 (127)

孙思邈的故里 张厚墉 (133)

孙思邈入川考 张厚墉 (136)

《新唐书·孙思邈列传》两点疑辨 张东达 (145)

《旧唐书·孙思邈传》笺证 樊 圜 (150)

《新唐书·孙思邈列传》注并今译 张东达 (163)

论《大医精诚》 黄长捷 (182)

《千金方》版本考 康兴军 (187)

孙思邈史料 樊 圜辑录 (202)

关于孙思邈医德中有价值的内容、 局限性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

孙溥泉

我国医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医学道德问题，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一书中关于“论大医精诚”等有关医德的论述，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文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古为今用”的教导，结合我们当前医疗卫生部门的实际情况，拟从孙思邈医德中有价值的内容、局限性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等方面加以论述，不妥之处，还望同道们批评指正。

一、孙思邈医德中有价值的内容

（一）怎样看待以往的道德？

有人说，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是最先进最高尚的道德，而孙思邈的医德是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属于旧社会的道德，谈论它就是宣扬封建主义的道德，因而应当加以禁止。这种看法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以往的道德？笔者认为，以往的道德，既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也有劳动人民的道德，对于这些道德（内容及其资料）是全部抛弃还是批判地继承，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在十年浩劫期间，林

彪、“四人帮”一伙，打着砸烂一切旧道德的极左旗号，不但抛弃了几千年的我国历史，而且破坏了民族英雄岳飞的坟墓，但他们自己确实继承了历史上一切叛徒卖国贼的衣钵，干着崇洋媚外、投降苏修等见不得人的卑鄙勾当。还有一些人，他们对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关键是思想上弄不清楚以往社会中产生的道德和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既有阶级性，又有继承性。我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道德史上的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是最先进最高尚的道德，它同历史上存在过的旧道德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共产主义道德同整个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一样，绝不是脱离人类道德发展的历史而孤立地突然出现的。历史的发展是世代相继的，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每一代人都是同以前各代留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料相联系的。每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不但具有适应本时代的内容，而且又都必须把前代思想文化中的好的东西吸收过来。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也不例外，吸收历史上已有的道德，包括劳动人民的道德以及剥削阶级道德在内的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和珍贵的精华，是共产主义道德产生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条件。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②

在我国，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几千

年的剥削制度，建立了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号召下，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广大医务人员，发扬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赴汤蹈火，历尽艰辛，出色地完成了极为繁重的战场救护任务，保障了解放区军民的健康；建国以后的和平时期，在消灭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的疾病以及抢救病人、治疗疑难重症方面，涌现了许多像李月华、吕士才、武健等那样以热血和生命换取病员健康的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可歌可泣的社会主义的模范医务工作者，他们的言行事迹在我国医德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十年浩劫期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医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一些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渗入到医疗战线，在少数医护人员中出现了如谋取私利、态度粗暴、假公济私、不负责任；看人行医，乱拉关系；追求名利、不学无术等作风，医疗质量下降，差错事故层出不穷，不但给病人身心带来很大痛苦，而且严重威胁着人民卫生事业的发展。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开展“五讲”

“四美”活动以来，医院经过整顿和加强管理，医德面貌、医疗质量明显改善，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要求。笔者认为，要恢复我们卫生事业的声誉和振兴我国社会主义的卫生事业，提高医务人员的道德素质是一个重要方面，而要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德素质，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医德，又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孙思邈医德中有价值的内容

①、“但作救苦之心”②、“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③；“不淫声色”④

在唐代，病人求医是很不容易的，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3“妇人方”中就谈到：“妇人产后百日……一朝困卧，控告无所，纵多出财宝，遍处求医，医者未必解此。”这里的“多出财宝，遍处求医”，就反映了病人求医难的状况。另外，在该书卷24“消渴、淋闭、尿血、水肿”门中，还谈到了一些医生“意在财物，不本性命”的情况，他说：

“大凡水病难治，差后特须慎于口味，又复病水，人多嗜食不廉，所以此病难愈也。代有医者，随逐时情，意在财物，不本性命，病人欲食肉，于贵胜之处，劝令食羊头蹄肉，如此者未见有一愈者。”

孙思邈对这种情况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⑤“但作救苦之心”④、“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③“不淫声色”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灵醕兼陈，看有苦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③”

今天，有少数医务人员，他们利用医疗手段搞交易，开后门，拉关系，他们对治病不感兴趣，却对病员的职业和单位特别感兴趣，他们或向病家索取（或暗示）礼物、烟糖、土特产，或者恣意利用某种职务之便，伪造病假证明、体检证明，健康证明，以达到“意在财物”的目的。更有甚者，通过几次接触以后，便开口借钱，名为“借”，而实为敲诈勒索，弄得病员啼笑皆非或心惊胆战；或者利用过期的药物去掉换病人没有过期的药物；或者把鹿茸精、进口丙种球蛋白不全部肌

注于患者身上，而留一部分注入自己体内；或者借职业之便，猥亵调戏，甚至奸污女患，违法乱纪。孙思邈上面的论述，如果能将“发大慈恻隐之心”改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对这些人，是完全适用的。

2、“心行平等”，“不怜富憎贫”，“不重贵轻贱” ④

在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人家有钱有势，贫民百姓无钱受欺。一般医生治病，往往“怜富憎贫”、“重贵轻贱”。孙思邈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认为，对待病人应当“心行平等”、“不怜富憎贫”、“不重贵轻贱”④；“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③

现在，有少数医务人员，他们看病时，对有权的职务高的和无权的一般群众不一样、对熟人和生人不一样；对衣着整齐、文化较高的和衣着破旧文化较低的不一样；对城市人和乡下人不一样；对男病人和女病人不一样；对较重较脏，传染性强的和一般病人不一样；对有研究价值和没有研究价值的病人不一样。他们是看人行医，而不是“普同一等”，孙思邈上面的论述，对这些人也完全适用。

3、“皆若至亲之想”、“见彼苦恼，若己有之”③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还指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皆若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戏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③

现在，有少数医务人员，对病人的病痛无动于衷，态度冷淡，应付了事。他们不但没把病人看成“至亲”，而且总觉得病人麻烦、罗嗦、难弄，他们常常习惯把病人当作“物”来称呼，如叫床号不叫姓名，甚至随便训斥病人，挖苦病人，要态度，发脾气，有的见死不救，将病人当皮球踢，推拖搪塞，从这个科踢到那个科，踢来踢去。为了怕麻烦，怕吃苦，怕增加死亡率，而把那些经过努力可以救治的病人拒之于医院大门之外。他们在病人排队诊治的紧张时刻，只顾自己津津乐道地聊吃谈穿，甚至打闹、开玩笑，还有的医务人员在紧张的手术台上谈吃谈穿，根本不把病人痛苦放在自己心上。救护车来了，病人家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个别医生听到铃响，仍稳坐不动，漫不经心，慢条斯理，拖延抢救。这些医生那里有丝毫“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之心呢？

4、“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③

在孙思邈生活的时代，医生工作多不负责任：“观今之医，……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叁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伍拾，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固亦难矣。”③他们不懂水肿与蛊胀的区别，“又有蛊胀，但腹满不肿，水胀，胀而四肢面目俱肿。大有医者，不善诊候，治蛊以水药，治水以蛊药，或但见胀满，皆以水药，如此者……愚医杀之。”⑥

“世有拙医，见患蛊胀者，遍身肿满，四肢如故，小便不甚涩，以水病治之，延日服水药，经五十余日望得痊愈，日复增加，奄至陨歿，如此者不一。学者当细寻方意，消息用

之，万不失一。”⑦还有的人，他们“抄写方书，专委下吏，承误即录，纰缪转多，近智之徒，不见正本，逢为经钞，以此而言，可为深诫”⑧，孙思邈认为，类似以上情况，都是绝对马虎不得的，他曾以针灸穴位举例说：“至如石门、关元二穴，在带脉下相去一寸之间，针关元主妇人无子，针石门则终身绝嗣，神庭一穴在于额上，刺之主发狂，灸之则愈癫痫，其道幽隐，岂可轻侮之哉”。⑨孙思邈深怕针灸书中的孔穴错了，会以讹传讹造成事故，曾亲自从事过校对：“旧明堂图年代久远，传写错误，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权等新撰为定云耳。”⑩孙思邈认为：“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⑪

现在有少数医务人员，对工作敷衍塞责，不负责任，粗心大意，草率从事。应诊时，心不在焉，对病人主诉似听非听，只听了三言两语，还没等病人说完，便将处方开了出来，真是快上加快，反正以早点让病人离去算数，什么视、触、听、叩、望、闻、问、切，都成了脑后之物。更有甚者，他们打针时拿错了药，化验切片时弄错了病人姓名；手术时将纱布、刀、剪等物遗忘病人体内；玩忽职守，急诊大夫急诊时间急诊室内找不到等。孙思邈上述论述对他们也十分适用。

5、“博极医源，精勤不倦”⑫

在孙思邈生活的时代，由于“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

阙而弗论”^⑤就是有些医生，也不认真钻研业务“方今医者，学不稽古，识悟非深，各承家技，便为洞达……卒不得挹其源流也。”^④由于医生不认真钻研业务，造成不少医疗事故，“愚医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时之经，或用汤药倒错，针灸失度，顺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灭亡，哀哉，蒸民枉死者半，可为世无良医为其解释。”^③孙思邈认为：“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俞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於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於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③孙思邈本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幼勤奋学习，七岁上学，“日诵千余言”^⑩，二十岁时便精通诸子百家之说，学问渊博，医术高明。但他从不自满，直到“白首之年，未尝释卷”^⑤。 he除了重视采制药物及临床实践外，还认真学习《素问》、《灵枢》、《甲乙》、《本草》以及张仲景的《伤寒论》、王叔和的《脉经》等医籍，同时又“涉猎群书”，吸取各家之长。为后代医家树立了“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榜样。

现在，有少数医务人员，胸无大志，不学无术，习惯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业务似懂非懂，满足现状，骄

傲自满，因循守旧，甚至不懂装懂，固执己见。例如，某单位有位医生，医疗技术不高，又不认真钻研业务，甚至对一些常用药物的药理作用和用途都搞不清楚。但却自作聪明，经常滥用药物。他有个熟人消化功能不好，三天两头闹肚子。因为是熟人，不好意思，每次就诊都给氯霉素或者合霉素，而且剂量比一般人大，用药时间也比一般人长。病人三个月后，变得面黄肌瘦，身体极度虚弱。经上级医院检查，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孙思邈上面的论述，对这些人是十分适用的。

6 “不得……訾毁诸医，自矜己德”③

在孙思邈生活的时代，医生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彼此之间，“皆相嫉害”。孙思邈对此非常愤慨，他指责道：“古来医人，皆相嫉害，扁鹊为秦太医令李醯所害，即其事也。一医处方，不当使别医和合，或私加毒药，令人增疾，渐以治困。如此者非一，特须慎之。宁可不服其药以任天真，不得使愚医相嫉，贼人性命，甚可哀伤，”③“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差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病人之膏肓也。”③孙思邈本人是一位虚怀若谷的人，他对凡是有“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⑤他不但没有“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反而在《千金方》中详细介绍了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名医的医疗经验。如他曾介绍甄立言的医疗经验时说：“治久心痛腹痛积年不定……甚至数日不能食，又便于出血，穷天下方不能差，甄立言处此方，数日即愈。”⑪他还介绍了甄权的针灸经验：“时有深州刺史成君绰，忽患颈肿如数升，喉中闭

塞，水粒不下已三日矣，以状告余，余屈权救之。针其右手次指之端如食顷，气息即通，明日饮啖如故。”⑧类似事例，在《千金方》中不胜枚举；与此同时，他还在该书中毫无保留地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医疗经验及历尽艰辛而搜集来的单验方，毫无“保秘”的想法，充分体现了孙思邈这种敬重同道、谦虚向别人学习并帮助别人的道德品质。

当前，有少数医务人员，彼此之间，文人相轻，互不服气，互相拆台：有的人骄傲自负，善于自我吹嘘；还有的人甚至不惜利用暗中造谣或当众谩骂的手法，贬低别人和攻击别人，抬高自己；或借工作之便刁难别人；对同行的差错、缺点，不是热情帮助，而是冷嘲热讽、幸灾乐祸。还有个别的人，为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中的名字排列顺序及奖励的分配问题，而常常争持不下，纠缠不休。类似情况，孙思邈关于“不得……訾毁诸医，自矜己德”的论述也是适用的。

二、孙思邈医德论述中的历史局限

有人说，孙思邈的医德是圆满无缺的，我们今天的医务人员只要继承恢复孙思邈和我国古代的医德技术传统就足够了。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阶级社会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这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孙思邈所论述的医德，既然是在封建社会中产生的，就绝对不可能超越产生它的那个时代，也不可能不受到该时代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29“禁经”门中，曾谈到“凡欲学禁，先持知五戒十善八忌四归”，实际上讲的也是医德，就是“咒禁师”医生的道德（唐代太医署内有咒禁师，《唐六典》说“按摩师咒禁师所掌如太医之职”），其内

容分别是：“五戒者，一曰不杀，二曰不盜，三曰不淫，四曰不妄语，五曰不饮酒嫉妒。”“十善者，一济扶苦难；二、行道见死人及鸟兽死者皆埋之，三、敬重鬼神，四、不行杀害，起慈悯心，五、不怜富憎贫，六、心行平等，七、不重贵轻贱，八、不食酒肉五辛，九、不淫声色，十、调和心性不乍嗔乍喜。”“八忌者，一忌见死尸，二忌见斩血，三忌见产乳，四忌见六畜产，五忌见丧孝哭泣，六忌抱小儿，七忌共女人同床，八忌与杂人论法。”“四归者，一不得著秽污不净淋衣服即神通不行，二不得恶口咒诅骂詈，三不得共人语诈道称圣，四不得饮酒肉杀害灭道”、“又云不得秽处诵禁文，又云不得与不信人行禁，又不得向人说禁法，又不得秽污手执禁文，又不得与杂人宣戏，又不得轻说神明，又不得嗔打六畜及人不得乘车马④”。其中除个别条款外（如“五戒”及“十善中之1、4、5、6、7、9条），其他各条对我们来说，大部分是不适用的。特别是“八忌”中的条款，如“忌见斩血”外科大夫如果照此办理，就别动手术了；“忌见产乳”、“忌抱小儿”、“忌见哭泣”，妇儿科大夫与护士如果照此办理，就无法从事治疗与看护的工作了；至于“敬重鬼神”完全是封建迷信，不仅不合乎道德，更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公民“有不信宗教的自由”之条文直接相抵触。

至于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所说的：“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只如鸡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

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③。”“不食酒肉五辛④。”如果我们的医生，都照他的话办理，病人不能食肉、蛋及各种牲畜家禽、鱼类，那么病人的营养供应就大为减少，岂不成了笑话。

孙思邈的医德内容，不仅有许多条文对我们不适用；而且有些条文内容的实质，也与我们的理解有着本质区别。例如孙思邈也讲“不淫声色”，但他却在《千金要方》卷27“养性”门“房中补益第八”中大讲“御女”之道，将用“足财力”买来的“少年未经生乳、多肌肉”的少女，作为有钱人家的“房中补益”之品，还说什么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等等，在他看来，这是有钱人家的男子在“补益以遗疾也”。可是，在我们看来，这种奸淫幼女的行为，不仅超出了“淫声色”的道德范围，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违法乱纪和犯罪行为，应当用法律严加制裁。

孙思邈的医德内容之所以许多条文对我们不适用，而且某些条文内容的实质也与我们的理解有着本质区别，关键还在于出发点上。孙思邈医德的出发点是佛教的“阴阳报施”思想，正如他在《千金要方》中所说的：“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道，鬼神报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其诬也哉③。”在《千金翼方》中，他说得更清楚、“人为阳善，人自报之，人为阴善，鬼神报之，人为阳恶，人自治之。人为阴恶，鬼神治之。故天不欺人，示之以影，地不欺人，示之以声。人生天地气中，动作喘息皆应于天，为善为恶，天皆鉴之⑫。”这就是说，行善是为了得到善报，不行恶是怕得到恶报，关键还是以个人利害得失作为出发

点，这与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许多医务人员，特别是像白求恩、李月华、吕士才、武健等这些具有无产阶级医德的医务人员，他们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大公无私、纯洁无瑕，心地纯正；对伤员极端的热情，极端的负责任；能不惜牺牲个人的休息、家务、健康和安危，去挽救病人的病痛，解救病人的痛苦。他们为病人解除痛苦，并不只“慈悲为怀”，而是同志间的爱护；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生前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解救病人痛苦的医疗卫生事业，死后还将遗体捐献给医学教育事业；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绝不需要什么“阴阳报施”来作为报酬。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所具有的医德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医德，不但从形式、内容及其出发点上与孙思邈的医德有着本质区别，而且远远超过了孙思邈医德数千万倍。这一点，也是今天我们评价孙思邈医德内容时所必须注意到的。

三、孙思邈医德的历史地位

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医德。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春秋时期名医扁鹊的医德，扁鹊不但很谦虚，也实事求是：“……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关于医生应当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早在《素问·疏五过论篇》，《素问·徵四失论篇》中就有论述。“疏五过论篇”这个题目，本身就是将五种过错列举出来，作出专篇讨论，以警戒后人。全篇指出，医生必须具有四种医德：一要了解自然界的

变化规律以及与人的关系；二要掌握脏腑生理、病理，正确使用针刺、方药等治疗手段；三要全面了解病人的社会、生活、精神、体质状况；四要审察色脉的变化。“徵四失论篇”这个题目，就是将医生在临证工作中易犯的四种过失提出来，以示惩戒。全篇分析了古代医生在临证工作中，不懂得阴阳逆从的道理；老师传授的医术尚未精通，就妄自施用杂术；不分病人地位的贵贱、生活的贫富、周围环境的好坏、形体的寒热及饮食嗜好、个性的区别；不问清楚疾病发生的情况及情志、饮食、起居等情况，仅凭诊脉判断病情等四种过失。《灵枢·师传篇》也谈道，医生为百姓治病时，应当“顺其志也”。即“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史记》中还记载了西汉时期淳于意的医德，淳于意如实地记载了他的医案，在他治疗的二十五个病例中有十例死亡，他实事求是，丝毫不加掩饰。汉文帝“问臣意：诊病决生死，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心不精脉，所期生死，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至于《后汉书》记载的针灸医生郭玉，也是“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此后的《难经·十二难》也指出：“阳绝补阴，阴绝补阳，是谓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如此死者，医杀之耳。”都是从医学这门职业对医生的特殊要求方面，提出了医生应当具有的道德规范。南北朝梁朝时期的阳泉，在其《物理论》“论医”一文中，引用了《褚氏遗书》的话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这里所讲的“仁爱”与“廉洁淳良”就专门谈到这个方面。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古代医家远在孙思邈之前就

对医德问题有所论述，但这些论述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只是由于孙思邈在临床实践中独具匠心地搜集整理并精心加工制作下，才使祖国医学的医德论述逐渐系统化，并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孙思邈医德思想的产生，从纵的方面讲，是我国医学事业医德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横的方面讲，又与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联系，即与孙思邈本人的主客观条件有关。

孙思邈生活于南北统一的隋唐时代，成书立业于盛唐时期。唐代，由于统治阶级吸取了隋朝灭亡的教训，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方面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为孙思邈研究医学继承以前历代医学家优秀的医德传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同时，由于唐代统治者提倡儒、道、佛三教，儒、道、佛三教中的一些道德观念也被孙思邈吸取并成为孙思邈医德思想的来源之一。孙思邈在“大医习业”中就提到“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这里的“五经”是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内经》实为《内典》之误（因孙思邈在文章开首已提到“素问”、

“针经”，且与“慈悲喜舍之德”联系起来看），《内典》是佛教的典籍。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论述医德时，还引用道教术语“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都可说明这一点。再加上孙思邈“弱冠喜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⑩”，完全拥有吸收儒、佛、道三教中道德思想的主观条件。除此之外，当时劳动人民中形成的团结互助、济贫扶危等道德观念在孙思邈医德思想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尽管孙思邈的医德思想，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全心全